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廊坊师范学院2017年度出版基金资助

传 播

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

贾奎林 李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河

基金项目

研究项目

聊城师范学院2017年度出版基金资助

传播

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

贾奎林 李新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贾奎林,李新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3-1850-1

I. ①传… II. ①贾…②李… III. ①传播学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2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书稿写作缘起“西方传播学本土化”话题，目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所谓“在未来一百年取代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宏愿。传播学在西方世界因战争宣传而成为显学，但就现实研究取得的成果而言，仍然难成一家之言。施拉姆宣称传播学可以取代所有人文学科，我们假定施氏所称是科学的、正确的。要取代所有人文学科，就会出现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质所在。毋庸置疑，人文社会科学均以人类行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本体意义。

意义学说，涉及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从意义建构之初的哲学、心理学，到意义形构与传播的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贯穿研究，笔者颇有迷失之感。曾经无数“山重水复疑无路”，遥遥不可及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但纵观研究整体，也并非一无是处。研究初步建构了“主体、主体间意义建构与传播”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诠释人类主体行为意义的坐标体系。哲学上认为，人类行为意义在于“成人”与“成己”，二者互为条件。“成己”是“成人”的前提和条件，“成人”是“成己”在更高社会层次的升华。意义，作为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动机与本质，形构着人类社会的本体理性，并物化为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客观世界。

意义，意味着人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理性认知。人的主体认知，既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意味着主体间纷争的根源。上帝将偷吃

“禁果”（“知是非果”）的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因为从那时起人开始有了独立于上帝的“是非”观念，即自身的主体意识。为了惩罚人类，上帝让脱离蒙昧的人们历尽苦难，并且摧毁了人类谋求共同体幸福的“通天塔”。从此，人们因具备主体意义而涅槃重生，却也因拥有主体理性而历尽劫难。书稿撰写，意在探究主体意义建构的方法、过程，以及主体间意义共享的结构和过程性要素。哪怕只是不经意间撩开了皇帝新装的一角，想来也颇有“细思极恐”之感。如是而已。

2017年10月 于廊坊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传播理论批判	(1)
第一节 西方传播学学科地位分析	(2)
一 缺乏一个真正科学的核心概念	(2)
二 价值诉求差异与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缺失	(6)
三 实践理性误读与研究范式差异	(9)
第二节 经验学派理论分析	(11)
一 科学主义方法论危机	(11)
二 非科学、非系统性碎片化理论体系建构	(15)
三 操控研究主体价值迷思	(18)
第三节 批判学派理论分析	(21)
一 解构资本主义传媒价值的“天才”批判者	(21)
二 主体价值“空无”	(24)
三 理论建构的“乌托邦”色彩	(27)
第四节 技术控制学派理论分析	(31)
一 本末倒置的“媒介决定论”	(31)
二 难于证实的“谏言”式表达	(33)
三 微观表述的局限性特征	(36)
第五节 找寻传播学重构的逻辑起点	(39)
一 威尔伯·施拉姆“百学之学”构想的艰难实践	(39)
二 于“继承”与“创新”间徘徊的中国“传学”研究	(42)
三 东西方学术思维差异及意义分析	(46)

四 传播——主体、主体间意义的建构与共享	(49)
五 “意义传播”研究的内容体系	(53)
第二章 微观意义建构分析	(57)
第一节 找寻意义	(57)
一 意义的定义	(57)
二 意义的本体与来源——客观与主观的辩证	(59)
三 意义的存在形态:从静态到动态的嬗变	(64)
四 意义的本质与内容	(68)
五 意义的意义	(71)
第二节 意义结构要素分析	(73)
一 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73)
二 心象、意象和想象	(77)
三 隐喻、象征与思维	(81)
四 主体、意向与语境	(85)
五 意义、动机和行为	(88)
第三节 意义建构图式	(91)
一 概念和内涵	(91)
二 格式塔认知模式	(95)
三 心理空间与意义建构	(99)
四 其他意义建构理论	(103)
第四节 意义的表述与解读	(112)
一 主体·语言·意义	(112)
二 语言建构	(116)
三 表述与解读	(121)
第三章 宏观意义系统分析	(133)
第一节 野蛮与文明	(133)
一 作为主体行为特质与方式的“野蛮”与“文明”	(133)

二 文明的进步与衰落	(139)
三 野蛮的生机与劫数	(145)
第二节 宗教与政治	(152)
一 宗教的社会形塑意义	(152)
二 儒教与君主专制	(158)
三 基督教与民主政治	(164)
第三节 “格栅”与“群体”	(170)
一 作为结构社会形态维度的“格栅”与“群体”	(170)
二 文明兴衰与“格栅/群体”互动	(179)
第四节 文化与行为	(189)
一 文明进化与行为意义	(189)
二 专制文化的苦难逻辑与民主困境	(198)
第四章 意义的传播与嬗变	(212)
第一节 传媒科技阴影下的民意表达	(212)
一 美国选战背后的“传媒魅影”	(212)
二 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意义系统	(214)
三 传媒科技与意义建构	(219)
第二节 作为枷锁,或者保障的信息传播法	(224)
一 基于利益分割的意义调控	(224)
二 意在操控的保护	(227)
三 重在保护的限制	(232)
第三节 意义传播的风俗场域	(236)
一 意义传播嬗变的民风、民俗制约	(236)
二 汉民风俗的双重极端特征与结构支撑	(239)
三 欧美风俗的宗教情结与技术理性特征	(243)
主要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55)

第一章 西方传播理论批判

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把视线从纸上移开，抬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线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岛民登陆的地方。他们从石器时代走出来，在一千二百年前乘着用最简陋的工具制作的独木舟到达这里。他们从东南亚出发，带着信奉的神、孩子和食物，在浩瀚的大洋上，从一个岛屿漂泊到另一个岛屿，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生存能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似乎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五千年漫长岁月的旅程于一千二百年前来到夏威夷。他们在这个熔岩的岛上登陆，撒下他们的种子，播下他们的文化，把这块土地归为己有。

那些最初的夏威夷人已经是灵巧的传播者。他们能够看懂天空中和海浪中的信息，利用这种信息来航海。他们已有发展得很好的语言，虽然能在图画和雕刻中记录下某些信息，但实际上还不能把语言写下来。不过，他们利用口语作为有力的工具，用口说的语言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和美满的家庭生活。……^①

之所以在本章的起始引述本段文字，是因为作为传播学集大成者，亦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er Schramm，1907—1987）在他创立传播学之初就没有准确界定，或者说混淆了传播学的研究对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社内部资料），根据美国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82年版译，第1页。

象,如此也就给后来者留下无穷遗患。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后来传播学原理的两个核心概念“传播”和“信息”,由上文可以看出施氏所谓“传播”研究对象应该为“传播者,或者人类的信息接受与传播行为”,这也算是确定了传播行为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但对于人类传播行为的客体“信息”,施拉姆却没有严格界定,这也许是导致后世理论研究体系驳杂,无法就某一特定理论维度整合相关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同时具备“物质、能量、信息”三重属性。作为物体三大属性之一,信息具备多种存在状态。以依附物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标志世界物质属性的自然信息和表述人类社会运行的人为信息;依据信息与人类认知实践关系可以分为未被人类认知的,以“自在”状态存在的未知信息和已为人类社会实践认知的“已知”信息,以及用于传达人类主体意愿的人造符号信息。

在人类“已知”信息范畴内又可分为表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自然科学信息和形容人类社会交往行为和精神世界变革的社会人文信息。人类科学研究的任务更在于以人类已知的相关信息内容为基础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的未知信息和规律。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物理、化学、数学,不一而足,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齐全,语言、艺术、历史,异彩纷呈。施拉姆没有告诉我们:传播学所要研究的是整个世界的信息流动,还是人类已知的信息内容?在人类已知的信息范畴内,是研究外在于人的信息内容,还是信息运转规律?如果是具体内容,则传播学研究内容会和具体学科内容重合,没有现实意义;如果研究人类已知信息的传播规律,还需回答:是研究已知信息本体传播的规律,还是人的信息传播行为特征?威尔伯也仍然没有给出严谨的答案。

第一节 西方传播学学科地位分析

一 缺乏一个真正科学的核心概念

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写道:“说传播学是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开始的,也许太夸张了,但是这些生物也能处理某种信息,这就是传播

学的实质。”^① 由此看来，施拉姆所谓的传播似乎就是生命体的信息处理过程。但是，无论是他所尊崇的赖以成就传播学理论的前传播学理论先驱们，或者还是在他之后发展传播理论的各派传播学专家学者，甚至于他本人《传播学概论》所集纳的各种学说理论并不都是严格，也无法以“生命个体的信息处理行为”为其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因为生命个体的信息处理行为至少包含生理行为和心理行为，其中的生理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属于生命医学研究范畴，而心理行为，虽则可以作为个体传播行为研究的基础，却无法涵盖人类传播行为的主体间过程，以及隐含于主体间传播背后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撰文提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三大流派：^②“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和“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在融合陈卫星、胡翼青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顾了传播研究的历史，分析了当代传播流派的理论特征和发展前景，最终却得出了相当悲观失望的结论。就传播学的理论起源而言，各位理论大师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实践价值。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相对成熟的社会实践活动，既与施拉姆所说的“单细胞动物的信息处理行为”相去万里，更与施氏所谓“传学”相差甚远。本质而言，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位社会学家，他从社会信息系统运行效率角度谈论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建构意义。这就意味着大众媒介产生之前，或者在大众传播媒介技术被超越的“后大众传媒时代”，社会信息系统运转不会因为大众传媒科技缺失而停滞，仅仅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转烙有特定的大众传媒科技技术特征罢了。也可以表述为杜威先生的社会有机系统学说因为大众传媒时代内容可能会表现出部分的传媒技术特征，而传媒科技却无法从根上影响杜威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的“镜中我”理论，以及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Mead，George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社内部资料），根据美国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82年版译，第6页。

②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Herbert, 1863—1931) 共同创立的“象征互动论”，就本质而言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在此基础上创立“拟态环境”理论。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但他在通过报纸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就其研究本质而言也属于社会人类学范畴。

施拉姆，在创制其传播理论过程中，抓住杜威社会学相关维持社会运转的信息传播特征作为人类社会运动的物质外壳，在库利和米德那里整合了人类机体内向传播机制，同时从帕克和李普曼的新闻研究中发现了大众传媒时代社会心理理论的媒介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施拉姆组合了人类机体、人类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大众传媒科技对社会心理运动的强化和放大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传播”仅是社会运动的外在表征，而所谓“信息”也仅仅是社会运动的外在现象性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理论的所谓“术语”仅仅是为已有成熟的科学理论穿上一件传播学的华丽“外衣”，却无法赋予其新学科的特有内涵。诺依曼（Noelle-Neumann, 1916—2010）的“沉默螺旋”无非就是“从众心理”的别名而已。作为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并没有在理论先驱那里“发展出”有别于母体学科理论体系，具备独特学科价值内涵的“核心概念”。这也就使得其后的各派理论在具体学科内涵缺失的“信息传播”概念统领下，“兼容并包”，各自独立，甚或是互相矛盾，互相攻击。

美国的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相对完备的传播“五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将信息传播研究的对象具体为“传者、受众、传播内容、媒介和传播效果”五部分。但就该学派四大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1900—1976）、霍夫兰（Carl Hovland, 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莱文（Kurt Lewin, 1890—1947）及其后来者的研

究成果而言,该学派的研究重心凸显在“效果研究”,以及源于效果研究目的的相关对象研究。在“经验—功能”学派为实现媒介传播效果而致力于操控技术研发的时候,欧洲的“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却对传媒操控负面社会影响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在资本主义文化歌舞升平背后发现了“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进权力系统。大众文化是技术理性的产物,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同质性的大众文化制造了单向度的人,进而形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单向维度特征。

被划归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申农(Claude Shannon, 1916—2001) 1949年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这个学派曾一度被归于“经验—功能”,因为该学派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为媒介的社会操控和重塑社会功能提供宏观的理论背景。其中,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和他的学生同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尤其著名。英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新媒介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视觉传播技术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地球村”等著名论断。同时,麦克卢汉也对媒介技术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深表忧虑,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①“新的媒介技术重构了社会生活,以致我们生活栖息在一个相互交叠的社会,没有文化等级也没有领域分工。地球在水平地、垂直地、瞬间地‘内爆’,这个‘内爆’通过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终结了公共领域。”^②

① [美]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② 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2页。

统观传播学研究三大流派研究重心,“经验—功能”学派致力于媒介技术社会操控功能,为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站在欧洲贵族主义立场批判作为传媒科技文化工业产品的大众文化的同质化、庸俗化、碎片化特征,同时对其作用于普通民众精神心智的“去精英化”,意识形态的“去革命化”,以及对资产阶级统治权力“固化”效果深表忧虑。技术控制论学派对于传媒科技的社会塑造作用深信不疑,同时忧虑技术相对于人类实践价值的“异化”。三者研究的对象好像并不是“信息与传播”,其共同的侧重点在于“传媒科技”的实施效果及其评价。传媒科技仅仅作为信息传播的阶段性技术特征存在,可能具备实践意义,相对于与人类主体行为相始终的信息传播行为则未免显得过于的狭隘和片面。

二 价值诉求差异与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缺失

构成西方大众传播理论主要学派的主体价值诉求差异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分野的逻辑起点。经验功能学派服务于特定社会中的“权力”,价值诉诸点在于为统治阶级提供通过传媒实施社会操控的行政理论与实用技术。这种权力服务诉求使得经验学派研究的开展以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经验学派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①传播学批判学派则从“为权力服务”的反面立论,“强调技术与权力的联盟通过媒体的强效力及各种可耻的宣传伎俩,使受众不可避免地成了被愚弄的对象,因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作的一种抗议和揭露”。^②

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1901—1972)认

①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解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为系统是“处在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①同时强调构成系统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普遍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相互作用实现系统的整体目的。一个成熟的学科门类，学科理论体系内的各部分内容应该能够相互印证，互为支撑，从学科理论架构的整体系统维度给予相关研究对象以相对科学、严谨的阐释和解读。但传播学不同学派理论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解读结论却呈现互相矛盾、互相否定，乃至碎片化的现实。总体而言，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体系大体呈现一种传播学学说史的架构，各个学说之间缺乏必然的、内在的理论关联，无法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陈力丹教授指出西方传播理论形成脉络大致呈现美国起源，美国、欧洲两地发展，经验学派、批判学派、技术控制学派三大学派各自独立的格局。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从原来的两极分野到三大学派并立，其中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从研究方法到终极价值追求都背道而驰，无法兼容于现实传播实践研究，技术控制学派理论幽深玄远，既可作为经验学派的宏远愿景，也可被批判学派用来指责批判经验学派研究的罪恶。三个学派各自独立，且各个学派自身均不足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实现完整阐释现实传播运行规律的价值诉求。甚至于各个学派理论内容自身也会出现无法自圆其说，乃至至于学派理论内部各阶段、分枝理论自相矛盾的现象。

经验学派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传播效果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其研究成果呈现对传播现象认知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先是1938年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研究极大地印证了“魔弹理论”的真理性，提出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一般理论。其后，拉扎斯菲尔德的“伊里调查”形成“有限效果论”，对魔弹理论形成否定，70年代以降的“宏观效果论”又对有限效果提出质疑。如此，经验学派理论发展就呈现认知逐渐深化，但缺乏真理性结论的状况。同时，新的研究成果却并不能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理论，甚至表现出与过去研究结果相类似，甚至于更大的局限性。各个时期相互否定的研究成

^① 杨春时等：《系统论 信息论 控制论浅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果甚至出现“共时性”的真理性再现。如作为经验学派研究成果存在的“自由主义理论”“专业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在当代西方新闻传播实践中似乎各有所持，争竞并存。同时，经验学派理论研究成果还呈现出支离破碎、碎片化的特点。比如同属于经验学派宏观社会效果论的“议程设置”“沉默螺旋”“培养”和“知沟”理论，四者之间各自独立，互不勾连，无法建构其相对严密，具有一定整体性，可以相对完整地解释传播现象的理论体系。甚至，这些被认为同时具备“真理性”的各个不同理论也可以在某些共同问题上自说自话，或者互相矛盾。

与经验学派一脉相承的技术控制学派“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其研究成果可以说开拓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同样也有导致“电子乌托邦”幻想的嫌疑。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非技术因素对社会传播效果形成的影响。同时，其高深玄远和哲理化的特点，使得技术控制学派研究必须与经验学派具体研究成果相结合才可能实现其传媒实践意义。否则，该学派理论对现实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是极其有限的，甚至于仅仅作为“理想”符号存在，其社会实践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再有，其对工具理性的过于依赖，对作为价值主体“人”的主体实践地位的忽视，使得其研究成果可以为任何学派拿来作为强调自身理论真理性的依据，从而使得技术控制学派丧失自身的主体价值，无法实现本学派研究的价值诉求。批判学派表现出强烈的无产阶级价值主体性特征，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研究。该学派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具备思想、情感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具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手段。其理论深刻犀利，给人多方面启发。“但物极必反，该学派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会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①从

^①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某种意义而言，也就丧失了其作为指导人类主体实践的价值意义。

三 实践理性误读与研究范式差异

国内学者认为西方传播学理论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源于其不同的“研究范式”，即认为适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是导致其结论迥异的根本原因。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传播学研究范式常常体现为某种范式的代表性理论和方法。比如说，“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方式以及最后的文本，很容易被判断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实证研究范式；而霍克海默或马尔库塞的理论建构及分析方法则很容易被判断为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判研究范式”。^①近年来，传播学研究不同范式之间的具体理论形态与研究方法差别呈现缩小趋势，问题在于日渐趋同的研究方式方法，却并不能让不同学派在研究结论，或者终极价值诉求方面取得共识。事实是尽管研究者们使用着日益趋同的研究武器，研究结论却较以往更加针锋相对。在价值追求上，也更加背道而驰，渐行渐远。南京大学学者胡翼青认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强调空间维度和工具理性，关注发生在眼下的经验事实，是一种天生能够与权力合谋的研究范式，因此它必然成为权力的工具。批判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反对解决问题的研究导向——更不要说是为权力服务的行政研究，而只是强调知性层面的批判精神。因此，批判主义范式在知识上的贡献几乎完全都是价值理性的”。^②

基于此，国内学者又似乎认为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皈依是造成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背道而驰的主要原因。殊不知，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定义的人类主体实践中，

^① 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解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同上。